



Wholly owned by UTAR Education Foundation
(Co. No. 578227-M)
DU012(A)

劉知幾《史通》論司馬遷之
史家修養

Study on Commentaries for Historian's Quality of Si Maqian
according to Liu Zhiji's Shih-t'ung

朱秋楣

CHOO CHIU MAY

17ALB05615

拉曼大學中文系

榮譽學位畢業論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MAY 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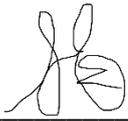
目次

宣誓.....	i
摘要.....	ii
致謝.....	i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2
第二節 文獻回顧.....	3
第三節 論文構思.....	6
第二章 史才三長論的淵源及形成.....	8
第一節 《史通》以前史家修養論的發展.....	8
第二節 史才三長論的形成背景.....	10
第三章 劉知幾論司馬遷史家修養.....	13
第一節 史學.....	13
第二節 史才.....	17
第三節 史識.....	23
第四節 才、學、識三長.....	27
一、三長之關係.....	27
二、司馬遷的才、學、識.....	30

第四章 結語.....	33
引用書目.....	35
附錄.....	38

宣誓

謹此宣誓：此畢業論文由本人獨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資料或參考他人著作，
無論是書面、電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體出處，並詳列相關參考書目。



姓名：朱秋楣 CHOO CHIU MAY

學號：17ALB05615

日期：2020年9月17日

論文題目：劉知幾《史通》論司馬遷之史家修養

學生姓名：朱秋楣

指導老師：余曆雄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唐代劉知幾在前人基礎下，首次提出史才三長論，指出史家應具「才」、「學」、「識」的條件，建構出一套史家修養理論的雛形。本文將從《史通》內外篇中，搜尋有關史才、史學、史識的論點，建構出史才三長之論證，後再從其三長內涵出發，分析劉知幾對司馬遷有關史才、史學、史識的評價，審視其評價是否基於其三長論並具備客觀性。正文先以一章梳理《史通》以前史家修養論的發展，並分析史才三長論的形成背景，後再以一章分析、歸納劉知幾的史才三長論及對司馬遷的評價，透過縱向比較歷代學者對司馬遷的評價，總結出劉知幾對司馬遷評價的特色。由於劉知幾受時代及自身能力的局限，其評價多顯苛刻，其中亦有不少矛盾及偏駁之處，故需慎辨之。

【關鍵字】 劉知幾、司馬遷、史通、史家修養、史才三長

致謝

時光匆匆，三年的學習生涯隨著畢業論文的呈交悄悄走到了句點。此時的我彷彿釋去肩上重任，渾身輕飄飄的，我也料到期待已久的解放換來的會是，久久的悵然若失感。憶起初次接觸畢業論文之際，我帶著滿滿的學習熱忱選擇了余曆雄老師，想要往史學方向進攻。在此，要對余老師致上十分的感恩之情，感謝您在我選題之初，迷茫之際，給予我寶貴的指導。最終，我才得以定下這個題目，並完成論文初稿。

今年初，新冠病毒無預警的突擊讓全世界打了個激靈，讓原本就不簡單的畢業論文變得更加挑戰。學校的關閉讓回校查找論文資料、與老師面談等的過程帶來重重阻擾。雖然這段期間鮮少與老師聯絡，但仍要感謝老師對我的包容，讓我省去一些後顧之憂，能夠全心專注於畢業論文中。在與畢業論文交戰期間，最大的困難其實源於我自己，這是一場考驗自律、毅力，漫長且痛苦的內心戰。在查找資料、閱讀資料、思考與撰寫的過程中，內心深處多番出現拉扯、掙扎、逃避等情緒。所幸能在一次又一次的逼迫中成長，最終完成了這項艱巨的任務，但由於時間與精力有限，這份論文仍有許多不足之處，望讀者多多包涵。

最後，感謝家人和朋友一直以來的陪伴與鼓勵，每當撐不住時，我總會別過頭，看看手機，與你們交談幾句，沒多久，我的動力又會被激發。感謝你們讓我在孤軍奮鬥的路上多了一道美麗的風景！緻我親愛的朋友們，正所謂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來到了離別的這一天，心中有許多不捨，最後化作一句——我們再聯絡！

第一章 緒論

在中國漫長的史學史上，出現過許多豐富的典籍及優秀的史家。史家作為史學的主體，其修養是影響史書品質的主要因素。唐朝史學家劉知幾（661-721）提出「史才三長」，認為優秀的史家需兼備「才」、「學」、「識」三長。自此，中國史家修養的課題由針對史家個體的批評，走向針對史家群體的批評的理論層面。劉知幾字子玄，彭城（今江蘇徐州）人，永隆元年（680年）進士，於武則天時期擔任過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書少監等職，兼修國史。他一生從事史學工作，著述甚多，但現僅有《史通》傳世，其餘均亡佚。《史通》是第一部系統性總結史學理論和方法的專著，該書論述範圍甚廣，論及史官源流、史書體裁、史書評論、史學方法、史學修養、史料鑒別等史學課題，總結了唐前及唐初的史學發展。除去散佚的三篇，該書今存49篇，計內篇10卷36篇，外篇10卷13篇。

這部史學批評著作「多譏往哲，喜述前非」¹，即使是被尊崇為「良史」楷模的司馬遷（前145或前135-前95）所撰的《史記》也不例外。《史記》是中國首部紀傳體通史，記載了上自黃帝，下至漢武帝長達三千多年的歷史。全書分五大體例，即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一百三十篇。《史記》的成就涵蓋哲學、文學、史學等方面，對後世影響深遠。本文嘗試爬梳《史通》中有關史家應具備的「才」、「學」、「識」

¹ [唐]劉知幾著、[清]浦起龍通釋、呂思勉評、李永圻、張耕華導讀整理，〈自敘〉，《史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206。

的論述，建構史才三長之論證之餘，審視劉知幾對司馬遷的評價是否基於其三長論，再進一步衡量其評價是否公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劉知幾著名的史才三長論是學界的熱門課題，但他並沒有具體論述三長的內涵，導致後代學者對其三長論的認識多有歧義，學界對三長論的研究也缺乏更系統、更深入的論證。林時民〈劉知幾論史家技藝〉²一文從劉知幾的史才三長論論述劉知幾對歷代史家技藝的評價，將劉知幾史才三長的理論結合其在《史通》中對史家評析的實踐進行研究分析，視角新穎，給筆者帶來很大啟發。然其篇幅不長，對於歷代史家的評析也不夠深入，這興起筆者對《史通》批評物件的個體研究之念想。

《史通》中有關司馬遷《史記》批評的篇幅佔有不少的比例。司馬遷《史記》的研究在學界亦屬熱門課題，研究內容廣泛且深入，但以史家修養角度出發的研究並不多，與其他方面的研究相較薄弱。而以劉知幾的史才三長論來評價司馬遷的研究更少，有者篇幅也不長。故本文擬以劉知幾的史才三長論為核心，著重探討劉知幾《史通》中對司馬遷的評價，深入分析劉知幾對司馬遷史家修養的批評，以期能深入解讀劉知幾的史學修養論，同時也促進司馬遷史家修養的研究。

² 林時民，〈劉知幾論史家技藝〉，《興大人文學報》2003年第33期，頁681-698。

第二節 文獻回顧

目前，學界對於劉知幾的史家修養論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下文將回顧、梳理與本論文範疇相關的研究成果，最後嘗試作出分析及總結。傅振倫所著《劉知幾年譜》³一書系統介紹了劉知幾的生平，為《史通》研究必不可少之參考書。許凌雲先生所著《劉知幾評傳》⁴，分為上、下兩篇，上篇述劉知幾的生平，下篇評劉知幾的思想，內有專章討論其史家修養論。許多有關中國史學史的著述基本設有專章或專節論述《史通》，如金毓黻《中國史學史》⁵、謝保成《中國史學史》⁶、杜維運《中國史學史》⁷、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⁸及《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縱橫》⁹。

趙俊《〈史通〉理論體系研究》¹⁰一書對《史通》的史學批評理論進行了體系性的研究，從《史通》理論體系的學術淵源、形成的時代因素，到其理論體系的結構邏輯及各個範疇都有所探討。彭雅玲的《史通的歷史敘述理論》¹¹則梳理了劉知幾的歷史敘述理論的脈絡，於第五章闡明《史通》論歷史敘述的實踐，其中第一節的史才三長論，闡述三長的關係及內涵與後人對三長的補充。林時民的《中國傳統史學的批評主義——劉知幾與章學誠》¹²以史評、事評、人評三個角度切入，探討劉知幾《史通》及章學誠《文史通義》兩書的史學批評。其

³ 傅振倫，《劉知幾年譜》（北京：商務印書館，1934）。

⁴ 許凌雲，《劉知幾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

⁵ 金毓黻，《中國史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⁶ 謝保成，《中國史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⁷ 杜維運，《中國史學史》（臺北：三民書局，2002），第二冊。

⁸ 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⁹ 瞿林東，《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縱橫》（北京：中華書局，1994）。

¹⁰ 趙俊，《〈史通〉理論體系研究》（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0）。

¹¹ 彭雅玲，《史通的歷史敘述理論》（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3）。

¹² 林時民，《中國傳統史學的批評主義——劉知幾與章學誠》（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3）。

中，人評一章以史臣史家為中心，從史家人格類型、品格及技藝方面來審視劉知幾與章學誠的評見。劉知幾的直書、曲筆論的研究亦是熱門的專題，相關的專書有香港的許冠三先生所著的《劉知幾的實錄史學》¹³。

論文方面，學界在論及中國古代史家修養論的研究時，劉知幾承前啟後的史才三長論是熱門的研究內容，如瞿林東〈說中國古代史學的優良傳統〉¹⁴，古偉瀛〈撰史憑誰定良窳？一試論「良史」的變與不變〉¹⁵及李瑛〈中國古代治史修養思想論略〉¹⁶，對劉知幾的史家修養論皆有一定篇幅的論述。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於2016年第10期發佈的《學習與探索》期刊設有中國古代史家修養論專題討論¹⁷，對中國古代史家修養論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考察，其中有汪高鑫的〈從「素心」說到「三長」論：晉唐間史家修養論的形成〉¹⁸。有關史才三長論形成與發展的論文成果也包括耿天勤的〈論劉知幾「史才三長」論的形成和發展〉¹⁹及王嘉川的〈唐宋元時期的史才三長論〉²⁰。〈唐宋元時期的史才三長論〉從「史才三長」論的提出到唐宋元時期學者對「史才三長」論的討論發揮及直接應用，討論了「史才三長」論在唐宋元時期的發展歷程。

¹³ 許冠三，《劉知幾的實錄史學》，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3。

¹⁴ 瞿林東，〈說中國古代史學的優良傳統〉，《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4期，頁5-15。

¹⁵ 古偉瀛，〈撰史憑誰定良窳？一試論「良史」的變與不變〉，《台大歷史學報》2009年第44期，頁1-41。

¹⁶ 李瑛，〈中國古代治史修養思想論略〉，《北方論叢》2010年第6期，頁87-90。

¹⁷ 該期刊共發表了三篇專題文章，另外兩篇為王記錄〈「三長」的深化與「心術」的提出：宋元時期史家修養論的發展與特徵〉及郭蔚然〈從「二善」說到「史德」論：明清時期史家修養論的總結〉。

¹⁸ 汪高鑫，〈從「素心」說到「三長」論：晉唐間史家修養論的形成〉，《學習與探索》2016年第10期，頁150-159。

¹⁹ 耿天勤，〈論劉知幾「史才三長」論的形成和發展〉，《山東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4期，頁71-73。

²⁰ 王嘉川，〈唐宋元時期的史才三長論〉，《史學理論研究》2014年第2期，頁28-38。

對於劉知幾的史才三長論具有比較詳細論述的論文包括臺灣學者郭宗南的〈從劉知幾《史通》論史才三長〉²¹及林時民的〈劉知幾論史家技藝〉²²。後者結合劉知幾的史才三長論與劉知幾在《史通》中對史家評析的實踐進行研究分析，論述劉知幾對歷代史家技藝的評價，視角有別於以往的研究。臺灣學者林時民〈史學批評的批評：《史通》的《史記》論析〉²³一文，除了從歷史編纂學、史學思想方面探討劉知幾對司馬遷的評論，也從史才三長論出發，依據才、學、識審查了司馬遷，最後得出司馬遷為良史的結論。另外，學界尚有許多《史通》研究的論文設有專章論述劉知幾的史家修養論，這裡省略不述。

總體來看，學界比較多關注史家修養論的演變及發展，對於劉知幾的史才三長論的研究，缺乏更加深入和具體的研究。

²¹ 郭宗南，〈從劉知幾《史通》論史家三長〉，《育達科大學報》2013年第36期，頁121-141。

²² 林時民，〈劉知幾論史家技藝〉，頁681-698。

²³ 林時民，〈史學批評的批評：《史通》中的《史記》論析〉，《台灣師大歷史學報》2008年第40期，頁31-56。

第三節 論文構思

劉知幾三長論的提出並非偶然，而是由一些主觀與客觀的條件因素所導致的。本文第二章將闡述劉知幾史才三長論的淵源及形成，先以一節梳理《史通》以前史家修養論的發展，再以一節分析史才三長論的形成背景。本文第三章則以文本分析為主，審視《史通》內外篇關於史家才能、修養的評述，歸納劉知幾的史學修養論點，進而分析和總結其史家修養論。該章設四節分別討論史才、史學、史識及才、學、識三長，前三節除了論述史才、史學、史識的內涵，也將從其內涵出發，分析劉知幾對司馬遷有關史才、史學、史識的評價，並指出其矛盾及偏駁之處。第四節才、學、識三長則分兩部分，第一為三長之關係，第二為司馬遷的才、學、識。第二部分將縱向比較《史通》前後的學者對司馬遷之評價，歸納總結劉知幾對司馬遷評價的特色，進一步衡量評析劉知幾的評價是否客觀。由於範圍甚廣，筆者知識水準有限，無法將歷代學者對司馬遷的評價羅列在內，若羅列過多也顯繁雜累贅，故筆者只取較為幾個評價與劉知幾的評價作比較。筆者通過縱向的對比，期望能夠全面地把握及論證劉知幾的史家修養論，並探討司馬遷在劉知幾史才三長論的審視下，是否合乎良史之准，為司馬遷的研究提供另一個面向。

劉知幾的《史通》對司馬遷的史才、史學、史識較少有直接的評價，其更專注於對史書體例等的批判。筆者以為史家修養既然會影響史書的品質，史書的品質自然也會反映史家的主體修養，故本文將一併收集知幾對《史記》的評價，借此來反觀司馬遷的史家修養。史家修養涉及的層面廣泛，與史家的識見、史料的類別、史事的採擇、史事的敘述、史體的得失息息相關。為了避免過度

描述體例、方法等問題，本文在分析過程中主要從史家修養角度出發，探討司馬遷《史記》所反映出的史家修養。由於劉知幾對司馬遷及《史記》的評價分散在各個專題中，本文將盡所能搜集其評價，並整理、統計出次數，列成表，使劉知幾對於司馬遷及其《史記》的批評重點更加一目了然。

第二章 史才三長論的淵源及形成

史才三長論的提出是史家批評從個體邁向理論趨勢的里程碑，考察三長論的淵源及形成有助於瞭解史才三長論承先啟後的意義。本章先以一節追溯劉知幾三長說之源，簡要地梳理《史通》以前史家修養論的發展線索，後一節則探討史才三長論形成的背景因素。

第一節 《史通》以前史家修養論的發展

春秋時期是古代史學發端時期，亦是史家批評的萌芽時期。自孔子稱讚晉之董狐為良史以後，後代常以「良史」讚揚出色的史家，「良史」一詞的內涵逐漸變得豐富。瞿林東在《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縱橫》²⁴中將史家修養、史家職責、史家成就列為史家批評中較為重要的三個問題。筆者以為「良史」的內涵主要建立在這三者上，前人多根據史家修養、職責及成就來下評價。如《左傳·宣公二年》記載孔子對晉大史董狐書「趙盾弑其君」的評價：「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²⁵其中「書法不隱」的評價正是以史家職責出發，褒揚董狐遵守禮法制度記事，不隱諱的作法。又據《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記載：「（齊）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

²⁴ 瞿林東，〈修養·職責·成就——史家批評論三題〉，《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縱橫》（北京：中華書局，1994），頁144。

²⁵ 《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1999），下編，頁598。

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²⁶齊國太史和南史雖無「良史」之名，但他們在面對生命威脅前仍秉筆直書、不畏懼的精神也廣為人稱譽。此事件顯示史家恪盡職守、據事直書之餘，更彰顯了史家自身的修養。

東漢時期，班氏父子對《史記》作了評價，班固在父親的評價上加了「實錄」精神的讚揚：「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²⁷此處的良史之才主要稱讚司馬遷的文字表達能力，並且能夠實事求是地記載的修養。

南朝梁劉勰的《文心雕龍·史傳》是第一篇專論史學批評之文，其讚語曰：「史肇軒黃，體備周孔。世歷斯編，善惡偕總。騰褒裁貶，萬古魂動。辭宗邱明，直歸南董。」²⁸他認可周公、孔子完備史書體裁的成就，推崇左丘明的文辭技巧及南史氏、董狐的直書精神，其所評實已涵蓋史家修養、史家職責、史家成就等範疇。他還提出「素心」說，要求史家撰史時「析理居正，唯素心乎！」²⁹，即心無偏私，對歷史進行實事求是地記載。前人「書法不隱」、「實錄」的評價是針對史書呈現而言，而劉勰的「素心」說則強調史家自身的主體意識，要求史家在撰史時要有公正無私的修養。

唐初，《隋書·經籍志》史部後序也論及了史家修養：「夫史官者，必求博聞強識，疏通知遠之士，使居其位，百官眾職，鹹所貳焉。是故前言往行，無不識也；天文地理，無不察也；人事之紀，無不達也。」³⁰此處與劉勰強調

²⁶ 《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下編，頁1016。

²⁷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02），第9冊，頁2738。

²⁸ [梁]劉勰著、楊明照校注，《增訂文心雕龍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208。

²⁹ [梁]劉勰著，《增訂文心雕龍校注》，頁208。

³⁰ [唐]魏徵等撰，《隋書·經籍志》（臺北：史學出版社，1974），頁992。

的又有所不同，此處強調的是「博聞強識」和「疏通知遠」的修養。若把劉知幾的「三長論」與前人所述的對比一番，可見其相似之處。顯然，知幾是在前人的基礎上，提出了才、學、識三長說。

第二節 史才三長論的形成背景

劉知幾在回答禮部尚書鄭惟忠「自古以來，文士多而史才少」的問題時，提出了著名的「史才三長」論：

史才需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籝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至於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榘楠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夏古已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³¹

此處的「史才」指具有才能，優秀的史家。他認為史才比文士少的原因在於，史才所需的條件比文士所需的還多，史才需具備三種特質，即「才」、「學」、「識」。他以比喻的方式來闡述「三長」的內涵及相互的關係。有學而無才，就如同愚笨的經營者，即使有百頃良田和滿筐黃金，也不懂得利用，最終無法

³¹ [後晉] 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75），第十冊，頁 3173。

獲利。有才而無學，如同缺乏木料和斧斤的巧匠，空有一身超群的技藝，最終無法築成宮室。他將「才」比喻作技能和智慧，「學」比喻作材料和工具，認為史家不僅需具備豐富知識和完備的史料，還應有選擇、組織史料的能力及編撰、敘述的技巧。才、學是史家的必備條件，而史識則是能夠劃分史家高低的條件，能夠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知懼的史家，是為史家修養的最高境界。劉知幾歸納前人的觀點，將史家修養提升到理論層面，總結成才、學、識三個範疇，這在史學批評上是空前的。

劉知幾認為自古以來，符合三長的史家極其少見，更大膽直言「世無其人」，視三長為史家修養崇高的理想標準。他的三長說不僅是對過去史學發展作出的反思，亦是針對時弊而發。如今雖無法考察這番言論具體是在何年提出，但從這史學領域的問題來看，基本可以確定這是他身任史職期間或之後所說的。長安二年（702），他出任著作佐郎，正式入史館修史，官職在後來雖有所遷改，但史職多年不變。長期任職於史館的他深悉史館弊制，再加上他與幾位史館監修的著史理念相悖，在撰史上受到了種種束縛。景龍二年，他向監修國史蕭至忠上書退職，其辭職信提出了史館修史的「五不可」³²，這篇文章後被收錄於《史通·忤時》篇中。知幾認為文士與史才不同，他反對文人修史的風氣，也不滿那些不具才能的史官空有職位，而才、學、識正是知幾理想中的史才標準。

劉知幾能在前人基礎有深刻的反思，提出三長說，這與其家庭背景及個人志趣、經歷也脫不了關係。劉知幾出生於書香門第，其從祖父劉胤之曾任宮中史官修史，其父兄則精於詞學，這樣的家庭為他提供了充足的經濟條件和圖書資源，再加上父兄的言傳身教，他的童年飽受文化薰陶。他夙好史學，二十歲

³² [唐] 劉知幾，〈忤時〉，頁 437。

時就遍覽古今史籍，為他日後的治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在〈自敘〉篇就提及自己自小就愛深鑽細研，分析事物的道理，即使是對前代哲人的著述也敢質疑，可見其批判精神自小就有了。隨著自身的學識和閱歷不斷增長，身擔史職的劉知幾深切感受到史家撰史的難處，同時作為史家的歷史責任感也越發激昂。以上種種的條件因素激起其對史學領域的熱愛與反思，也促使了其史才三長論的提出。

第三章 劉知幾論司馬遷史家修養

雖然劉知幾並沒有將史才三長的具體內涵說清楚，其《史通》中也沒有明文提出史才三長，但《史通》畢竟是劉知幾之作，其在評論史家、史書、史事時，都會憑著心中定見在闡述他的史學觀點時來對史家進行評價。筆者以為其中有許多篇目的內容與才、學、識相關，參證其《史通》全文後，即能得其史才三長論之精闢。下文亦將分析《史通》中有關知幾對司馬遷史家修養的評價，進一步探討被世人稱為「良史之才」的司馬遷在知幾心中的地位為何，並述評其評價得失。

第一節 史學

史學是指具有淵博的知識，佔有豐富的史料。劉知幾主張史家需具備淵博的知識及史料掌握周備的條件。在史料方面，劉知幾認為通過徵求不同的說法，採集各家的言論，方能使史書成信史，成不朽之作。如其在〈采撰〉篇所云：

「蓋珍裘以眾腋成溫，廣廈以群材合構。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懷鉛握槧之客，何嘗不徵求異說，采摭群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³³其在〈雜述〉篇中也有所強調：

³³ [唐] 劉知幾，〈采撰〉，頁 84。

芻蕘之言，明王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棄。故學者有博聞舊事，多識其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夫子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則書有非聖，言多不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³⁴

劉知幾認為史家不能僅讀聖賢書和經典之言，而不讀其他的書，反而應博學多聞，擴大閱讀範圍，獲取豐富的知識，並從中選擇適當的史料來撰史，切忌憑空杜撰。博學多聞意為所閱讀的範圍不拘時間遠近，亦不拘大小事，「籍多聞以成博識」³⁵。「學」與「識」具有互益關係，學可以養識，知識的拓展會提高一個人的見識，反之亦然。

劉知幾指出，在閱讀時也要注意不能抱著馬虎的態度，若「讀書不精」³⁶，便無法對事情有較為全面的認識，嚴重者甚至會導致後來撰史的失誤及偏頗。此外，若「識事未精」³⁷，即對事物的探討還未精深時，就輕率撰史，是自不量力的表現。故史家在博學多聞之際還要認真思考辨別其中的是非，以獲得正確的認知。總的來說，若史家還未達到博學多識，認識及辨別事物也未能做到全面且公正，不僅會導致其判斷失誤而使所撰史書出現錯誤，就連撰史者本身也不會意識到自己的不足之處。

司馬遷二十歲時便抱著凌雲壯志，開始了人生中第一次遠遊，他到大江南北、淮河兩岸及中原河山實地考察，搜求遺文古事，並採集傳說逸聞，獲得了豐富的史料。後來，從奉使巴蜀以南之游至扈從武帝之遊，皆使其視野大大開

³⁴ [唐] 劉知幾，〈雜述〉，頁 195-196。

³⁵ [唐] 劉知幾，〈雜說中〉，頁 354。

³⁶ [唐] 劉知幾，〈雜說中〉，頁 354。

³⁷ [唐] 劉知幾，〈雜說中〉，頁 351。

闊，見識亦獲增長，對百姓社會生活有著更深的認識。³⁸劉知幾讚揚《史記》采錄《世本》、《國語》、《戰國策》及《楚漢春秋》，史料來源豐富，能成一家之言。他認為司馬遷的《史記》能自成一家，名傳古今，亦與「其事尤大，記之於傳可也。」³⁹相關，褒揚《史記》所記之事皆是重要且可取的。此處知幾肯定《史記》的淵博，後又闡明對《史記》多采《周書》、《國語》、《世本》、《戰國策》這類舊記載的不滿，導致讀者無法得知更多的異聞異事，略顯自相矛盾。他質疑班固對司馬遷「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為勤矣」⁴⁰的評價，指出《史記》既多采舊事何來勤也？在體例上，知幾認為司馬遷將一些《紀》、《傳》未能盡記的，就算只是一些字句章段，也詳細載錄於《書》中，這樣通博的記載突顯了司馬遷淵博的才識。⁴¹他認為《史記》雖記載詳備，但仍有遺漏的事例沒有記載到。他批判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論自古以來宦官被士人輕視的例子時，以彌子瑕為開始，卻不記載春秋時期夙沙衛被輕視的著名例子⁴²。他更因此質疑司馬遷「博考前古，而舍茲不載，至於乘傳車，探禹穴，亦何為者哉」⁴³，譏諷司馬遷的史學見識仍有淺顯之處。

後來，知幾後又批評《史記》的史料來源：

³⁸ 張大可，《司馬遷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41-47。

³⁹ [唐]劉知幾，〈采撰〉，頁389。

⁴⁰ [漢]班固，《漢書》，第9冊，頁2737。

⁴¹ [唐]劉知幾，〈采撰〉，頁42。

⁴² 春秋時期，齊國有個宦官叫夙沙衛，在晉國追擊齊國之際，他位於隊伍最後面抵擋晉軍，郭最認為由閹人來殿后是齊國的恥辱；齊國討伐魯國時，齊侯派夙沙衛去慰問被俘虜的臧堅，臧堅見是閹人來慰問，倍感恥辱，寧願選擇死。

⁴³ [唐]劉知幾，〈敘事〉，頁338。

故作者惡道聽塗說之達理，街談巷議之損實。觀夫子長之撰《史記》也，殷、周已往，采彼家人。……夫以芻蕘鄙說，刊為竹帛正言，而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斯亦難矣。嗚呼！逝者不作，冥漠九泉；毀譽所加，遠誣千載。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⁴⁴

他批評《史記》中有關殷、周以前的史料採集自親人之口，他認為這種「道聽塗說」和「街談巷議」欠缺真實性，毫無史料價值可言。筆者以為殷、周以前的時代離司馬遷久遠，當時的事蹟多為口耳相傳，在沒有紙本史料傳世的情況下，親人的言辭便是重要的史料。只要撰史者明辨慎思，剔掉可疑的部分，再採納可信之處即可。但這需要撰史者具備精深的學識，否則其判斷認知也不會是正確的。另外，陳漢章《補釋》認為知幾既然批評《史記》采家人之失，後所推崇的「三志」應為《晉乘》、《楚杙》及《魯春秋》，而非一般所指的三史，即《史記》、《漢書》、《東觀漢記》。程千帆在《〈史通〉箋記》中反駁陳漢章的說法，他認為《春秋》已在《五經》之中，斷不可能又列入三志內，而《晉乘》、《楚杙》早已失佚，知幾又從何得知其不采家人，不訪故老。再者，《史通》常以「五經」「三史」相對成文，此處應是知幾誤將「史」字寫為「志」。其先是指出了《史記》之失誤，後又舉《史記》為準繩，這實為子玄的失誤。⁴⁵此外，知幾不滿司馬遷《屈原列傳》採錄《漁夫辭》，將屈原在江邊遇到漁夫的虛構之事當作逸事收集並編入史籍中，誤導了後人。⁴⁶對此，呂思

⁴⁴ [唐]劉知幾，〈采撰〉，頁 86。

⁴⁵ 程千帆，《〈史通〉箋記》（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頁 86。

⁴⁶ [唐]劉知幾，〈采撰〉，頁 382。

勉認為「《漁夫》之辭，自非事實，昔賢采此，或亦以人人知為辭賦之流，使人作辭賦觀，非使人作敘事文觀也。」⁴⁷

總的來說，劉知幾對司馬遷的史學有褒有貶，他認為《史記》中有關殷、周以前的史料來源不可靠，但殷、周以後的史料卻掌握得十分周備。整體來說，司馬遷《史記》的體例完備，內容豐富，但仍有一些未盡人意之處，知幾牢牢抓住這些失誤，拋出對司馬遷史學淵博的質疑。筆者以為知幾能客觀地指出司馬遷的史學為有識之舉，但他對司馬遷的批判過於苛刻，將司馬遷的失誤放大至抹殺其長處，顯得十分偏頗。畢竟，即使撰史者再博學多聞也無法突破時代的局限，收集到很多時代久遠的史料，撰出毫無遺漏及失誤的史書。

第二節 史才

史才是指選擇、組織史料的能力及編撰、敘述的技巧。我們可以從史書的文字、語句、篇章表達及安排上辨別史家的才能。正如劉知幾說：「夫飾言者為文，編文者為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備矣。」⁴⁸因此，「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⁴⁹，也「以敘事為工」⁵⁰。劉知幾主張敘事須簡要、隱晦，煩省得中，在〈載文〉、〈敘事〉、〈煩省〉、〈點煩〉等篇中都有所強調。在劉知幾心中，能達到簡要、隱晦、「文而不麗，質而非野」

⁴⁷ [唐] 劉知幾，〈采撰〉，頁 371。

⁴⁸ [唐] 劉知幾，〈敘事〉，頁 126。

⁴⁹ [唐] 劉知幾，〈敘事〉，頁 119。

⁵⁰ [唐] 劉知幾，〈敘事〉，頁 122。

⁵¹境界只有《堯典》至《春秋》的著作，它們是史書中最高的境界，而《史記》、《漢書》則僅次於它們。

綜合古今的史書來看，他認為古代的作品是後人所未能及的。尤其是《史記》、《漢書》以後的史書，文字日益煩富，難以稱上簡要。知幾認為史書要做到「簡而能要」，達到「文約而事豐」⁵²。舉例而言，劉知幾認為在記人物的才能品行方面的簡要可以透過四種方式體現，一是直接敘述；二是記述人物的事蹟來顯示；三是借別人之言語來表明；四是在論贊中寫出。他認為只需在才行、事蹟、言語、論贊四種方式中選擇其中一種突出人物品行即可，不必「兼而畢書」，否則著墨太多，易顯繁瑣。他也列舉了一些史書作為例證進行評價，其中，他稱讚《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借助論贊說明「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⁵³，並不在本紀和列傳中記載的做法。然而，整體來看，知幾認為歷代史書普遍犯有「兼而畢書」的毛病，從《公羊傳》、《穀梁傳》、《禮記》、《新序》、《說苑》、《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直到官修《五代史》都有，只有左丘明、裴子野、王劭沒有這樣的毛病。

達到簡要的方法還有省字和省句兩種，省句容易，而省字較難。劉知幾認為字句簡約，省略掉不重要的，只列出重要的，即能達到隱晦，讓讀者從簡賅的語句中感受到言外之意，見表知裡，並且能夠進一步舉一反三。知幾推崇古史的隱晦，他認為《史記》、《漢書》以前的史書簡潔扼要，能夠反復誦讀、推敲，而《三國志》、《晉書》以下的史書繁雜瑣碎，批判時下的駢文風氣，原能以一字概括的也要湊成雙字，從而判定「是則一貴一賤，不言可知，無假

⁵¹ [唐] 劉知幾，〈敘事〉，頁 119。

⁵² [唐] 劉知幾，〈敘事〉，頁 122。

⁵³ [唐] 劉知幾，〈敘事〉，頁 122。

權揚，而其理自見矣。」⁵⁴對於《史記》、《漢書》二史的隱晦，知幾則認為它們雖次於先秦的聖人之作，但仍有可取之處：

洎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如失左右手；漢兵敗績，睢水為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⁵⁵

若不與《五經》比較，班固的《漢書》和司馬遷的《史記》其實有許多處已達隱晦，值得稱道。

除了簡要和隱晦，劉知幾認為撰史者應避免對字句妄加修飾，因為史書與文章的性質不同，史書重視真實性，只需實事求是地記敘歷史，達到「文而不麗，質而非野」的境界即可，而文章則更講究文采。因此，知幾認為撰史者應認真辨析所寫的字句，避免虛引古事或假託古詞，這不僅達不到原要達到的效果，反而會使讀者感到困惑。知幾批判《三史》以後的史書多有妄飾現象，有些將句子修飾得不切實際；有的文體如賦頌，用詞似俳優，使得文學不像文學，歷史不像歷史。⁵⁶

知幾專立〈點煩〉篇，摘取《孔子家語》、《史記》、《漢書》、《晉書》、《十六國春秋》的個別段落，用紅黃筆標注應修改、刪除之處，以讓讀者更進一步理解敘事之法。然而，原本早已不存，傳下來的本子也沒有了點煩的痕跡，無法考證。從正文的敘述中，知幾認為史書繁冗的表現有三個，一是

⁵⁴ [唐] 劉知幾，〈敘事〉，頁 127。

⁵⁵ [唐] 劉知幾，〈敘事〉，頁 127。

⁵⁶ [唐] 劉知幾，〈敘事〉，頁 131。

前後重複；二是詔書全文收入；三是對史文理解不透，該省的內容不省。篇中以《史記》所摘的條數最多，達 11 條，而《孔子家語》則兩條，《漢書·龔遂傳》、《新晉書·袁宏傳》、《十六國春秋》分別為一條。知幾在〈雜說上〉篇中的《史記》八條亦舉出了幾個繁冗之例證。他舉《史記·佞幸列傳》云：「文帝崩，景帝立。」的例子⁵⁷，認為即使不說明「文帝崩」，只說「景帝立」，也可知「文帝崩」，故「文帝崩」三字大可刪掉。又，《史記·倉公傳》敘述了倉公曾受黃帝、扁鵲脈書的教授，能通過面部五色來診病，由此判斷生死，診斷出疑難雜症是否可治。文帝詔見他問其長處，其回答與上面敘述的內容完全相同。知幾批評上文花筆墨闡述該事，下文又通過人物對話重複敘述該事，兩者形式雖有不同，但內容卻是一樣的，沒必要再重複。而這類的錯誤在《史記》中並不少見，故他對劉向、揚雄皆服司馬遷擅於敘事的評價感到質疑：「豈時無英秀，易為雄霸者乎？不然，何虛譽之甚也。」⁵⁸接著，他認為論贊之用處為解釋疑惑，若文章淺顯易理解就不必敘述，但司馬遷卻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在各篇末皆寫一段論說，即使沒必要，也要勉強寫出一段文字，由此斷言史論的繁瑣自司馬遷開始。對於《史記》的繁冗，他指出：「《屈原傳》曰：『其文約，其辭微。』觀子長此言，實有深鑒。及自撰《史記》，榛蕪若此，豈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乎？」⁵⁹即使司馬遷深知簡約之美，但自己撰史時卻也無法完全實踐簡約之道。然而，以當世之法來對古時之作譏議，並不恰當，正

⁵⁷ [漢] 司馬遷撰、[宋] 裴駰集解、[唐] 司馬貞索隱、[唐] 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第 10 冊，頁 3880。

⁵⁸ [唐] 劉知幾，〈點煩〉，頁 335。

⁵⁹ [唐] 劉知幾，〈點煩〉，頁 324。

如浦起龍總按所云：「觀是書者，切磋商之，固不必為煩者病，亦不得謂點煩者苟。」⁶⁰

劉知幾在闡述簡要、隱晦、妄飾的問題時，視角總擴大於古今，每每以先秦史書來作比較，強調時下史書的文字繁瑣風氣，藉此鼓勵時下的史家提高自身的修養。他不斷闡明一代不如一代的事實，也意識到這樣的趨勢實際上也是由客觀因素即時代不同而導致的。他認為好的史書的出現取決於時代，而「史才」與史料息息相關，若某些時代沒有發生奇聞異事，沒有出現英雄，史料也不周備，撰史人也難以表現自己的敘事能力，要出現好的史書、史家也有點難。舉例而言，其對司馬遷的敘事評價為：「觀子長之敘事也，洎周以往，言所不該，其文闕略，無複體統。洎秦、漢已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有足稱者。」⁶¹他認為司馬遷在周代以前的記事不周全，文字也「闕略」，不成體統，但秦漢以後的敘事「條貫有倫」，很值得稱道。

此外，劉知幾認為時代因素亦是導致歷代史書詳略不均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古今不同，勢使之然也」。他從荀卿「遠略近詳」⁶²之說論起，認為年代久遠，史料越難收集，著述只好簡略；年代越近，史料較容易收集，史料越多，著述自然就詳細。除了史料收集的容易度，時代風氣也是其中一個客觀因素。他認為古代世風淳樸，言辭較為簡單，史書載事自然就簡略；後代文風崇尚華美，史書記事自然就繁多。因此，在評價後代史家史書時，不能拿他們與古代的相較，對他們的得失一概而論。他反對「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⁶³，以史書的總字數及整體篇幅來比較前後代史書是不客觀的。他進一步舉了華

⁶⁰ [唐] 劉知幾，〈點煩〉，頁 327。

⁶¹ [唐] 劉知幾，〈敘事〉，頁 120。

⁶² [唐] 劉知幾，〈煩省〉，頁 188。

⁶³ [唐] 劉知幾，〈煩省〉，頁 189-190。

嶠和謝沈《後漢書》作為例子，指出若嗤笑它們的語言比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更繁瑣，未免太荒謬了。他認為只要史書把該記載的記載，沒有疏漏即可。然而，這不代表史家自身不必重視煩省問題，文字結構的條理、文字的精簡與隱晦及文字妄飾的問題仍是史家須注意的。知幾在〈核才〉篇中便舉了一個例子：「孝標持論談理，誠為絕倫。而《自敘》一篇，過為煩碎；《山棲》一志，直是文章。諒難以偶跡遷、固，比肩陳、範者也。」⁶⁴他認為南朝劉峻雖擅於立論談理，但其一些文章或過於繁瑣、或簡直是文學作品，難以與司馬遷、班固、陳壽、範曄並談。可見，知幾在敘事上仍強調「文之於史，皎然異轍」⁶⁵。

劉知幾對於「才」的標準是文字簡要，隱晦，不妄飾，而這要求史傢俱有編排、組織史料及撰寫的能力，故從史書的文字敘述即可判斷出司馬遷的史才。班固讚揚司馬遷「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⁶⁶，他從史才方面肯定司馬遷的組織能力及質樸的文字表達。然而，劉知幾對此略有保留，他批評司馬遷《史記》有許多繁冗的表現，隱晦度亦不比《五經》，但與後世較多妄飾之作比較仍為上乘之作，值得稱道。此外，劉知幾雖意識到史才的發揮、史書的好壞除了源於史家自身的修養外，還由一些不可控的時代因素導致。但他仍常常拿古今之作比較，有時也顯得過於苛刻，是其矛盾之處。筆者以為劉知幾雖瞭解史書的好壞受限於時代等因素，但他因自身經歷關係，帶著對所處的時代風氣的強烈不滿而撰筆，藉語出驚人來勸告史家要盡己所能，發揮好自己的能動性。

⁶⁴ [唐] 劉知幾，〈核才〉，頁 178。

⁶⁵ [唐] 劉知幾，〈暗惑〉，頁 178。

⁶⁶ [漢] 班固，《漢書》，第 9 冊，頁 2738。

第三節 史識

劉知幾在回答鄭惟忠「史才少」的問題時，他對於史識的說明是「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俱」。劉知幾十分重視「善惡必書」的修養，他在《史通》中也專立〈直書〉、〈曲筆〉來說明。事實上，劉知幾在回答鄭惟忠時並沒有將史識的定義完整說出來。閱讀了其所撰的《史通》後，可知他提出的「識」是一種判斷能力，並不局限於「秉筆直書」，還包括作出客觀、有見地的評價。史識亦可表現在對史事、人物或史書的認識及評價上。

在史料方面，「識」是指選擇材料入史時的判斷能力與準確程度。舉例而言，史家若無法達到博學多識，那在選擇史料時就無法作出準確的判斷，將民間奇異的傳聞也編入史，使得內容不實。人們對人、事物的看法是以自己主觀的認識為標準，這種認識又根據個人背景、閱歷、性格、價值觀等而不同。因辨別、判斷能力的不同導致他們看待同一問題的角度都不同，觀點自然也不同。同樣的史書，不同的史家對它會有不同的評價，這就源於彼此鑒識的不同。如〈鑒識〉篇所說：

夫人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各異。蓋三王之受謗也，值魯連而獲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見詆。斯則物有恆准，而鑒無定識，欲求銓核得中，其唯千載一遇乎！況史傳為文，淵浩廣博，學者苟不能探蹟索隱，致遠鉤深，烏足以辯其利害，明其善惡。⁶⁷

⁶⁷ [唐] 劉知幾，〈鑒識〉，頁 148。

劉知幾認為「物有恆准，而鑒無定識」，因此對同一件事往往「毀譽不同」、「愛憎各異」。此處的鑒識是指品評鑒別的能力。他認為中肯的鑒識很難得，需要學者深入探究，以獲取其中深遠的道理。時移世遷，後人在不熟悉過去的背景，對史書是很難作出確切評價的。因此，他們需要有淵博的學識，深刻把握史書作者的觀點下，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作出評價。知幾進一步舉了《尚書》、《左傳》、《史記》、《漢書》等諸多實例作了論證。其中，他指出後人對班、馬優劣的看法有偏差，如王充著《論衡》，以班固為甲等，司馬遷為乙等；張輔則持班固劣於司馬遷之論。他認為這兩種論述皆有各自的長短處，可以把他們並列在一起參看。

「夫識有不燭，神有不明，則真偽莫分，邪正靡別。」⁶⁸當人們對事物的認識不清或有誤時，他們往往辨不清是非真假，在判斷和作出評價時就容易失准或穿鑿附會。司馬遷的《史記·五帝本紀》、七十列傳中稱說虞舜被困，藏身於井壁空穴中，後穿孔而出。而《史記·仲尼弟子傳》則稱孔子死後，門人就推崇外觀酷似孔子的有若為師。知幾指出這些記載比褚先生為《史記》所補篇章還鄙俗，但世人卻依然推崇司馬遷，只指責褚先生。後人對前人的錯誤非但沒指出，還硬要為他們解釋，掩飾他們的失誤，這是「識」不足的表現。再如葛洪將《史記》把伯夷置於列傳之首的原因，解釋成表達對「善而無報」的憤恨，而把項羽列於本紀，則是要表達對「居高位者非關有德」的看法。⁶⁹另外，針對上一節所提到的史書簡略問題，史家應具備史識條件，以客觀的態度深入探討作者的觀點及出發點，才能正確理解史書的內容，不要隨意偏袒作者，否則優秀的史著也會因缺乏好的評價而被遺忘人世。

⁶⁸ [唐] 劉知幾，〈暗惑〉，頁 422。

⁶⁹ [唐] 劉知幾，〈探蹟〉，頁 152。

劉知幾對於司馬遷的史識較少直接地評價，故要掌握其評價，需關注其對《史記》的評價。首先，他指出比起編年體難辨的敘事，紀傳體的分類清晰，更易令讀者掌握。他充分肯定司馬遷開創紀傳體之功，五大體例的分類十分妥當：「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為長也。」⁷⁰然而，司馬遷雖劃分了分類，但界限並不分明，還常有「破例之象」，使後世學者較難理解其用意。劉知幾指出，《史記》體例紕繆甚多，《世家》、《本紀》、《列傳》皆有不守義例的歸類。如從後稷直到西伯文王的姬姓，還有從伯翳直到莊襄王的嬴氏，他們的爵位是諸侯，《史記》卻將他們歸類於本紀。項羽逾軌自稱為王，司馬遷不將其納入世家，反而立本紀稱其為王。這類不分真偽，是非顛倒的行為不僅誤導後人，更達不到史書懲惡勸善的主旨。對此，張大可《史記體制義例簡論》一文認為劉知幾犯了以後代史著情況來指責前代史著，倒果為因的錯誤，以斷代史《漢書》的標準反過來衡量《史記》的體例。張大可指出馬班優劣在史識，而非兩書體例之得失，以《漢書》體例來斷言司馬遷之劣正是劉知幾的不足之處。⁷¹再者，知幾批判《史記》常把不同時代的同類人物編排在一起，時將後輩提至卷首，時將前輩降到篇末。如將漢代的賈誼與戰國時的屈原、春秋時的曹沫與戰國時的荊軻、老莊與申韓合傳，論大道先黃、老而後《六經》。後代學者多認為知幾上述指責均不妥，實際上司馬遷的「破例」具有其深意，深入探討後可知這些「破例」皆彰顯了司馬遷卓越的史識。至於《表》方面，崇尚簡要的知幾反對《史記》把表、志插在本紀和列傳中，

⁷⁰ [唐]劉知幾，〈二體〉，頁21-22。

⁷¹ 張大可，〈史記體制義例簡論〉，《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1期，頁40-41。

他認為只要互相核對《本紀》、《世家》、《列傳》三者，即可瞭解清楚史書所記載的史事，再列表則顯繁瑣。但他並非反對所有《表》，如他認為《史記·列國年表》可以保留，因為該表列出了春秋、戰國時期的各國年代，讓讀者一目了然。他在〈雜說上〉亦對司馬遷創表的功績給予了盛譽。

除此之外，知幾認為「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故在「史識」上特別重視史家能否辨別善惡，從而以客觀的態度秉筆直書。對此，他在〈直書〉篇說道：

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亂君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載。言之若是，籲可畏乎！夫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⁷²

他認為史學功用在於勸誡人們棄惡從善，樹立良好的社會風尚。只要如實記載亂臣賊子及昏君的所作所為，不掩蓋其過錯，就可將其汙穢行跡公佈於天下，遺臭萬年。如實記載的直筆精神是世人所推崇的一種精神，也是知幾心中最高境界的史家修養。他將史家撰史比喻作明鏡照物，不論物的美醜，鏡子都會如實地反映出來，表示史家應具備客觀的撰史態度。他主張「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⁷³，善或惡都要秉筆直書，「不掩惡，不虛美」⁷⁴。然而，這不表示必須好不遺漏地記錄所有大小事，只需保留重要的史事即可。他在〈直書〉篇中舉了歷代秉筆直書的例子，其中提到「馬遷之述漢非」⁷⁵，贊揚他即使危在旦夕，

⁷² [唐] 劉知幾，〈直書〉，頁 140。

⁷³ [唐] 劉知幾，〈惑經〉，頁 289。

⁷⁴ [唐] 劉知幾，〈雜說下〉，頁 388。

⁷⁵ [唐] 劉知幾，〈直書〉，頁 140。

也要記載漢帝的過失。班固也曾稱贊：「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⁷⁶這些都肯定了司馬遷實事求是的客觀態度。

第四節 才、學、識三長

一、三長之關係

劉知幾在和鄭惟忠提出三長說時，以比喻的方式闡述了才、學之間的關係。經過上文對才學識的解析，我們可以得知若不具備組織史料及敘述的技巧的能力，即使博學多聞，史料掌握再多，也寫不出好的史文。而若掌握的史料不足，知識有限，即使文字表現能力再好，也作不成史的。可見，他認為才、學是一位史家必備的基本條件，區分文士與史才的條件則在於史識。他在〈核才〉說道：

但自世重文藻，詞宗麗淫，於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每西省虛職，東觀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鉛，多無銓綜之識；連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而舉俗共以為能，當時莫之敢侮。⁷⁷

他批判推舉文士撰史的風氣，指出這些文士多數沒有在此務須慎重，因為片言只句往往形成得失是非。劉知幾指出史家的「浮詞」首先要簡約，避免煩富雜

⁷⁶ [漢] 班固，《漢書》，第9冊，頁2738。

⁷⁷ [唐] 劉知幾，〈核才〉，頁179。

蕪，接著不能帶著自己的愛憎好惡進行褒貶，亦不能評價不一，產生前後矛盾。這些問題的發生在於史家「鑒裁非遠，智識不周，而輕弄筆端，肆情高下。故彌縫雖洽，而厥跡更彰，取惑無知，見嗤有識。」⁷⁸ 換言之，史家若缺乏鑒別裁定的能力及才智見識，雖能夠迷惑無知之人，但總會被有識之士所嗤笑。

學識方面，史學一節中已提過學能養識及學識的重要性，這裏不贅述。劉知幾在〈雜說下〉的「雜識」條下提到學與識的關係：

假有學窮千載，書總五車，見良直而不覺其善，逢抵牾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謂藏書之箱篋，《五經》之主人。而夫子有云：「雖多亦安用為？」其斯之謂也。⁷⁹

他將有學無識比喻作「藏書之箱篋，五經之主人」，徒有一身學問，卻不懂得辨別善惡，無法作出適當的道德價值判斷。如此，其所撰之史就無法達到彰善懲惡的作用。可見，史識為三長中的核心，其與才、學息息相連，也能輔助才、學，使史家達到更高的水準。在〈辨職〉篇中，知幾將史家劃成以下三種境界：

史之為務，厥途有三焉。何則？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勒成，鬱為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並闕，複何為者哉？⁸⁰

⁷⁸ [唐] 劉知幾，〈浮詞〉，頁 116。

⁷⁹ [唐] 劉知幾，〈雜說下〉，頁 385。

⁸⁰ [唐] 劉知幾，〈辨職〉，頁 200。

知幾首先推重董狐、南史「彰善貶惡」的直筆精神，接著是左丘明、司馬遷「編次勒成，鬱為不朽」的史著，再到「高才博學，名重一時」的史佚，倚相。可見，其以史識為重、史才與史學則後隨之。在「彰善貶惡」方面，知幾認為史書本應當以歌頌善人善事為主，以批判惡人惡事為次。在他看來，司馬遷、班彪等人是屬於彰善之史家，而晉國董狐、齊國南史是全力貶惡之史家，惟獨左丘明一人能夠兩者兼之，並注重文采而已。劉知幾更大膽指出後無來者可媲美左丘明，可見其對左丘明《左傳》的推崇。

然而，即使有才、學、識三長，史家也不一定能夠發揮其才。知幾在〈核才〉篇也論及時代背景給編史者帶來的局限，他認為即使有了才、學、識，胸懷修史大業的抱負，都會受到世俗的阻擾和無知者的譏笑。於是，即使有真知灼見，也因地位不高，沒有話語權，而放棄原則，隨波逐流地撰史。因此，「史才之難，其難甚矣」的成因不僅只是史家個人的因素，也由許多客觀的因素導致。這也意味著史才要突破這些客觀條件的束縛，不僅要有三長，還需要有過人的膽識。然而，擁有這種膽識不一定會讓受世人青睞，也會讓史家遇到更多的麻煩。

二、司馬遷的才、學、識

《史記研究集成》第八卷的〈司馬氏父子之才學識德〉一章⁸¹，整理了歷來學者對司馬遷的品德、才能、治學精神等的研究，以下舉出其中幾個評價，與劉知幾相比較，進行論述分析。

自班固以後，多有學者從良史之才層面論及司馬遷的史家素養，如晉人張輔曾將司馬遷和班固作比較，他從文字煩省、取材類型、史學見識及文采辭藻方面批評班固皆不及司馬遷，稱讚司馬遷為良史之才。⁸²本文第二節史才已論及劉知幾對張輔以總篇幅、字數來比較史書優劣的斥責，他否定了張輔在文字煩省方面對司馬遷的褒揚，對其餘三方面的評價則未加評論，亦無反駁葛洪對司馬遷良史之才的評價。西晉葛洪《西京雜記》卷四云：

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先達稱為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為《項羽本紀》，以踞高位者非關有德也。及其序屈原、賈誼，詞旨抑揚，悲而不傷，亦近代之偉才。⁸³

本文第三節史識中已提及劉知幾對葛洪「以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為《項羽本紀》，以踞高位者非關有德也」的否定，葛洪對司馬遷的揣測雖被反駁，但這卻不代表葛洪對司馬遷良史之才的評價就應完全推翻。雖然葛洪對

⁸¹ 張大可、安平秋、俞樟華等著，〈史記史學研究〉，《史記研究集成》（北京：華文出版社，2005），第8卷，頁244。

⁸²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2003），第6冊，頁1640。

⁸³ 楊燕起等編，《歷代名家評史記》（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頁5。

司馬遷分類立傳之意的揣測有待商榷，但比起知幾一面倒的批評，葛洪嘗試從司馬遷的角度來思考的正面評價更促發人深思，具有積極意義。

由以上史學、史才、史識三節所析，知幾對於班固給予司馬遷的評價並非完全贊同，他對班固所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為勤矣」⁸⁴，「服其善序事理」持有懷疑態度，對「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之評價則無表態。⁸⁵但他在〈直書〉篇中對「馬遷之述漢非」的評價頗合班固「不虛美，不隱惡」的評價。可見，知幾並不認為司馬遷具備完善的才、學、識三長。

南朝宋裴駟在《史記集解序》中闡明己見，認為班固對司馬遷的評價是妥當的，雖司馬遷《史記》「時有紕繆，實勒成一家。總其大較，信命世之宏才也」⁸⁶，讚揚其為命世之宏才。唐代的司馬貞亦認同司馬遷是個良史之才，他在《補史記序》對司馬遷稱譽連連，他表揚《史記》貫通古今，史料豐富，加上首創紀傳體例，內容包羅萬象，為後人紛紛效仿。他指出司馬遷君舉必書，褒貶恰當，為直書實錄，起到勸誡示人的作用。他更稱《史記》事廣文省，詞質理暢，甚至幾近完美。⁸⁷若從知幾的三長論看司馬貞的評價，可得出司馬遷為才學識兼具的史才。宋代朱熹的見解與裴駟「時有紕繆」的看法略同，他認為「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⁸⁸，不僅充分肯定了司馬遷的才識，也揭示出司馬遷撰史粗率的缺點。清代錢謙益對司馬遷的評價則注重在史識方面：「司馬氏以命世之才，曠代之識，高視千載，創立《史記》」⁸⁹，他還指出：「太史

⁸⁴ [漢]班固，《漢書》，第9冊，頁2737。

⁸⁵ [漢]班固，《漢書》，第9冊，頁2738。

⁸⁶ [漢]司馬遷，〈史記集解序〉，頁4035。

⁸⁷ [漢]司馬遷，〈補史記序〉，頁4047。

⁸⁸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3202。

⁸⁹ [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連標校，〈牧齋有學集中〉，《錢牧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冊，頁680。

公之才，秦漢以來一人而已矣」。⁹⁰以上幾位學者雖從不同的面向評價司馬遷的史家修養，但基本上皆可歸類成知幾提出的才、學、識三長。

有別於上述學者，知幾未能在《史通》中對司馬遷提出此類較為全面的評價，其評價更多的是針對史書體例等問題而展開。通過考察知幾對司馬遷《史記》的評價，可知他對司馬遷的才、學、識並沒有全盤肯定或否定，具有一定的客觀性。然而，比起上述學者對司馬遷優點的強調，知幾則更強調缺點的批評。如裴駰及朱熹對於《史記》的不足之處皆異口同聲地稱作「時有紕繆」、「粗率」，知幾卻毫無此認識，反而認為《史記》出現的「紕繆」妨礙了司馬遷成為才學識兼具的史才。如此，司馬遷在劉知幾史才三長論的審視下，並不完全合乎良史之准。

⁹⁰ [清] 錢謙益，〈牧齋有學集中〉，第 5 冊，頁 681。

第四章 結語

劉知幾首倡「史才須有三長」，主張史家應具備才、學、識的修養，而才、學、識之間緊緊聯繫，缺一不可。由於古往今來充分具備以上條件的史家少之又少，三長便成了史家修養的最高標準。遺憾的是，劉知幾雖貴為首倡者，卻沒有運用其三長標準，在《史通》中對歷代史家作具體的評論與分析。故，本文只能根據知幾三長論的概念，將《史記》的評價劃分出才、學、識三類，再總結出劉知幾對司馬遷史家修養的評價。

整體而言，劉知幾認為司馬遷《史記》比前人《五經》不足，但比後人之史著則有餘，在知幾心中的地位為第二等。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位列知幾心中第一位的史書，在現實中也絕對會有不盡人意之處。接著，在將其他學者對司馬遷的評價與知幾的進行縱向比較時，知幾嚴苛的史學批評特色顯得更為突出。以知幾嚴苛的角度來看，符合三長的史家果真「世無其人」，三長成為遙不可及的崇高理想。

知幾的高標準與偏激性由許多因素所致，從史學批評角度來看，注重體例的知幾偏於專注史法的層面，他堅持例不可破，法不可違的原則，對司馬遷《史記》的批評多在於其破例、違法，其他方面則不太重視。正因知幾受時代及自身見識限制，他對某些問題的評價（如破例的問題）難免欠缺公允，但他的討論對史家批評及史學修養發展仍有推動性意義。如清代學者章學誠，深刻認識到知幾的局限，故他主張講求體例的同時，又不能拘泥於體例，應該因時、情況而變通。

從影響層面來談，劉知幾的三長說開創了中國古代史家修養理論，對後世史家及學者影響頗深，後人多就其才、學、識的概念下延伸補充，並以此來作為衡量史家優劣的標準。《史通》更被四庫館臣譽為「監史」，足見其影響之大。本論文尚可拓展的研究課題包含劉知己以後對史才三長論的接受與發展，如章學誠對其加以發展深化，提出「史德論」，故可進一步探討章學誠的研究。此外，也可進一步探討劉知幾的史家修養理論對唐代和後世修史實踐的影響。

引用書目

專書(古籍)

1. [漢] 司馬遷撰、[宋] 裴駙集解、[唐] 司馬貞索隱、[唐] 張守節正義，《史記》，第10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
2. [漢] 班固著、[唐] 顏師古注，《漢書》，第9冊，北京：中華書局，2002。
3. [唐] 劉知幾撰、[清] 浦起龍通釋、呂思勉評、李永圻，張耕華導讀整理，《史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4. [唐] 房玄齡等撰，《晉書》，第6冊，北京：中華書局，2003。
5. [後晉] 劉昫等撰，〈劉子玄傳〉，《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6. [宋]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2004。

專書

1. 程千帆，《〈史通〉箋記》，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
2. 杜維運，《中國史學史》，第2冊，臺北：三民書局，2002。
3. 傅振倫，《劉知幾年譜》，北京：商務印書館，1934。
4. 金毓黻，《中國史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5. 林時民，《中國傳統史學的批評主義——劉知幾與章學誠》，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3。
6. 彭雅玲，《史通的歷史敘述理論》，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3。
7. 瞿林東，《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縱橫》，北京：中華書局，1994。

8. 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9. 謝保成，《中國史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10. 許凌雲，《劉知幾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
11. 許冠三，《劉知幾的實錄史學》，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3。
12. 楊燕起等編，《歷代名家評史記》，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
13. 姚松、朱恒夫，《史通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
14. 張大可，《司馬遷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
15. 趙俊，《〈史通〉理論體系研究》，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0。
16. 張大可、安平秋、俞樟華等著，《史記研究集成》，第 8 卷，北京：華文出版社，2005。

期刊論文

1. 耿天勤，〈論劉知幾「史才三長」論的形成和發展〉，《山東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 年第 4 期，頁 71—73。
2. 古偉瀛，〈撰史憑誰定良窳？一試論「良史」的變與不變〉，《台大歷史學報》2009 年第 44 期，頁 1-41。
3. 郭宗南，〈從劉知幾《史通》論史才三長〉，《育達科大學報》2013 年第 36 期，頁 121-141 。
4. 李瑛，〈中國古代治史修養思想論略〉，《北方論叢》2010 年第 6 期，頁 87-90。
5. 林時民，〈劉知幾論史家技藝〉，《興大人文學報》，2003 年第 33 期，頁 681-698。

6. 林時民，〈史學批評的批評：《史通》中的《史記》論析〉，《臺灣師大歷史學報》2008年第40期，頁31-56。
7. 瞿林東，〈說中國古代史學的優良傳統〉，《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4期，頁5-15。
8. 王嘉川，〈唐宋元時期的史才三長論〉，《史學理論研究》2014年第2期，頁28-38。
9. 汪高鑫，〈從「素心」說到「三長」論：晉唐間史家修養論的形成〉，《學習與探索》2016年第10期，頁150-159。
10. 張大可，〈史記體制義例簡論〉，《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1期，頁36-49。

附錄

序	劉知幾《史通》中對司馬遷《史記》的評語	出處
1	<p>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為本紀，考其宗旨，如法《春秋》。自是為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p>	六家
2	<p>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國家一政，而胡、越相懸；敘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其為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記，時采雜言，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p>	六家
3	<p>《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為長也。若乃同為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則雲語在《項傳》，於《項傳》則雲事具《高紀》。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荊軻並編。此其所以為短也。</p>	二體
4	<p>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效《禮經》。且紀傳之外，有所不盡，隻字片文，於斯備錄。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p>	書志

5	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	論贊
6	孔安國有雲：《序》者，所以敘作者之意也。竊以《書》列典謨，《詩》含比興，若不先敘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暢厥義。降逮《史》、《漢》，以記事為宗，至於表志雜傳，亦時複立序。文兼史體，狀若子書，然可與誥誓相參，風雅齊列矣。	序列
7	馬遷《史記》，采《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	采撰
8	觀夫子長之撰《史記》也，殷、周已往，采彼家人。……夫以芻蕘鄙說，刊為竹帛正言，而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斯亦難矣。	采撰
9	洎班、馬二史，雖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	敘事
10	觀子長之敘事也，洎周以往，言所不該，其文闊略，無複體統。洎秦、漢已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有足稱者。	敘事
11	既而馬遷《史記》，班固《漢書》，繼聖而作，抑其次也。	敘事
12	史之為務，厥途有三焉。何則？彰善貶惡，不避強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勒成，鬱為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並闕，複何為者哉？	辯職

13	若使直若南史，才若馬遷，精勤不懈若揚子雲，諳識故事若應仲遠，兼斯具美，督彼群才，使夫載言記事，藉為模楷，搦管操觚，歸其儀的，斯則可矣。	辯職
14	古之國史，能立言不朽，皆出自一家，如魯、杜門不出，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藏諸名山。	辨職
15	馬遷之述漢非。	直書
16	又遷之紕繆，其流甚多。夫陳勝之為世家，既雲無據；項羽之稱本紀，何求有憑。必謂遭彼腐刑，怨刺孝武，故書違凡例，志存激切。若先黃、老而後《六經》，進奸雄而退處士，此之乖刺，復何為乎？	探蹟
17	又子長著《史記》也，馳騫窮古今，上下數千載。至如皋陶、伊尹、傅說，仲山甫之流，並列經誥，名存子史，功烈尤顯，事蹟居多。盍各采而編之，以為列傳之始，而斷以夷、齊居首，何齷齪之甚乎？	人物
18	昔讀《太史公書》，每怪其所采多是《周書》、《國語》、《世本》、《戰國策》之流。……斯則遷之所錄，甚為膚淺，而班氏稱其勤者，何哉？孟堅又雲，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服其善敘事。豈時無英秀，易為雄霸者乎？不然，何虛譽之甚也。……而劉、揚服其善敘事也，何哉？	雜說上
19	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采《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則不取其本書。以為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也。案《論語》行於講肆，列於學官，重加編勒，只覺繁費。如	雜說上

	管、晏者，諸子雜家，經史外事，棄而不錄，實杜異聞。夫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斯著述，未睹厥義。	
20	自敘如此，何其略哉！夫雲「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者乍似同陵陷沒，以寘於刑；又似為陵所間，獲罪於國。遂令讀者難得而詳。	雜說上
21	昔《春秋》之時，齊有夙沙衛者，拒晉殿師，郭最稱辱：伐魯行唁，臧堅抉死。此闔官見鄙，其事尤著者也。而太史公《與任少卿書》，論自古刑餘之人為士君子所賤者，唯以彌子瑕為始，何淺近之甚邪？但夙沙出《左氏傳》，漢代其書不行，故子長不之見也。夫博考前古，而舍茲不載，至於乘傳車，探禹穴，亦何為者哉？	雜說上
22	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敘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耆而相排。雖燕、越萬裡，而於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尺之中雁行有敘，使讀者閱文便睹，舉目可詳。	雜說上
23	司馬遷之《敘傳》也，始自初生，及乎行曆，事無臣細，莫不備陳，可謂審矣。而竟不書其字者，豈墨生所謂大忘者乎？	雜說上
24	而司馬遷、習鑿齒之徒，皆采為逸事，編諸史籍，疑誤後學，不其甚邪！	雜說下

25	史有固當以好善主，嫉惡為次。若司馬遷、班叔皮，史之好善者也；晉董狐、齊南史，史之嫉惡者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飾，其唯左丘明乎！自茲以降，吾未之見也。	雜說下
----	--	-----